



MAKESI DONGFANG SHEHUI LILUN DE LISHI CHENSI

马克思东方社会 理论的历史沉思

王聚芹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华北电力大学

引进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马克思东方社会 理论的历史沉思

王聚芹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王聚芹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11
ISBN 7-206-05122-7

I. 马… II. 王… III.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研究—东方国家
IV. A811.6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9844 号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

著 者: 王聚芹

责任编辑: 杨九屹 封面设计: 马继东 责任校对: 彦 民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网址: jlpph.com

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75 字数: 241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5122-7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一、选题缘由

马克思、恩格斯建构东方社会理论所依据和解剖的重点范本中，印度早已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俄国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张望、争辩，经过艰难探索，它们社会主义革命剧的第一部已经谢幕。东方大国中，唯有中国仍继续肩扛马克思主义大纛而奋勇前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导致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缩减毕竟给社会主义带来重创，这似乎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否定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历史合理性以确凿无疑的口实，以致于形成了一股质疑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思潮，“社会主义终结”、“马克思主义彻底失败”的叫嚷甚嚣尘上。实践困境和来自方方面面的诘责向东方社会主义者提出了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与东方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正确解释东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所有艰难等问题。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提出、发展、丰富作为总背景，梳理、明辨这一理论的全部内涵并赋之予时代生命，成为当今东方社会主义者最亟切的理论课题。

笔者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沉思》这一课题，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

但是，无论以往苏联学界，还是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都对这一理论的完整把握不够重视不够，严重影响、甚至制约了东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时代困境的总解答，对整个人类的解放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深受殖民奴役的东方解放也没有逃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视界。走出封闭、走向现代化是东方实现彻底解放的主题。但基于东方现实，以何种方式才能真正触碰到东方根本问题，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轨迹中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变化。

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东方社会初始，他们基本上把东方看作是类似于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资本扩张同样对东方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而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他们对上述观点作了非常重要的修改。而招致马克思、恩格斯反思东方现代化之路的，是东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发展总态势。

(1) 俄国民粹派营垒的分化与转变。民粹派思想启蒙者以民族生存特殊性和资本附带的社会两极对抗为由，拒绝融入资本主义，同样拒斥资本的积极成果，坚持在小生产和封闭中虚构“村社社会主义”，这种村社社会主义实际上对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进行了唯心史观的解读。

而随着俄国社会现实的发展，民粹派营垒发生分化，民粹派分子中的一部分仍然片面坚持俄国特殊性，拒绝现代化，拒绝世界交往，否认唯物史观对俄国发展的普遍指导意义。但是，相当一部分民粹派成员开始接受唯物史观，逐渐转到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来。他们试图用唯物史观解读俄国现实，为俄国未来寻找出路，并诚心向马克思求教，希望马克思对俄国革命予以指导。

(2) 俄国社会矛盾丛集，居于革命的边缘。农奴制改革使俄国广大农民深陷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中，无产阶级所受的苦难也甚于西方，阶级冲突日益激化，已经将俄国推上世界革命的前台。俄国现实吸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目光，由此而开始研究俄国非资本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将民粹派抵制资本主义弊端的提案搁置于世界交往的总框架中进行根本重铸，在唯物史观和

民族视野的交汇中，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终蕴成。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是继发现唯物史观这一人类社会根本规律之后，又在社会研究领域实现了更大历史性突破：在世界视阈和民族视野的有机汇合下，寻求不同国家和民族各自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从而将社会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总规律贯彻到整个人类社会领域。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是完整理解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关键，对这一理论的充分阐释不仅关系到被历史检验和证实了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也关系到东方如何抉择当下发展道路的现实问题、甚至是关乎其未来进程的重大问题，东方社会理论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篇章。

但是，由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不是一个逻辑严密规范、详尽备至的理论体系；加上马克思对东方发展路径选择的转向集中在晚年的研究中，而他晚年手稿、甚至与马克思社会理论关系密切的最重要几部手稿的面世和出版大大滞后，以至于人们忽略了马克思对东方发展特殊性的思考；在后继的传承链中，特别是第二国际理论家漠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限制了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深度挖掘和完整呈现；斯大林时代也未将完整理解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伟大意义作为理论研究的要务，甚至存在诸多偏见乃至误解。这种情况限制了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发挥解释东方、改造东方现实的效能。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缺失是东方遭遇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今东方社会主义居于历史发展的关节点，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深层研究。

2.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经由理论转化为现实实践，是一个更复杂、更艰难的过程，其中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历史中反思前人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体现为根据国际背景变换和东方经济、政治结构和革命形势相合而生的不断丰富、发展的开放体系，从而使落后的东方能与先进的共产主义相联接，并在共产主义这一宏伟蓝图指引

下前进，社会主义之路是东方民族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但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存在着产生谬误的多种诱因：东方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早已与马克思时代存在巨大差异，东方社会主义者必须敏锐洞察国际、国内情势，也必须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理论抉择和创新。而在理论取舍、拓展、延接过程中，极可能存在理解偏差。因此，每一步都是对东方社会主义建设者能力的严峻考验。由于以往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真髓理解不足或者认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和偏误，加剧了社会曲折发展的可能。特别是在东、西方社会发展反差强烈，西方资本主义环视并试图将东方沦为附庸的情况下，更加剧了东方社会主义建设的凶险性。

由于上述原因，使东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一些问题并遭遇挫折。东方社会主义之路不是不可为而为之路，而是难为而为之路，列宁对这种情形极富洞见，“在革命以前，以及在革命以后，我们都是这样想的：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至少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尽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还是尽力去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存苏维埃制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是为了国际革命”^①，东方之所以坚守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它是东方社会彻底摆脱外强奴役和实现人民解放的唯一途径。

东方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从理论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从弱小到强大、从鼎盛到挫折、从困顿到反思的曲折的历史磨砺之后，为了总结历史教训，鉴戒当下，警示未来，尽量减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和错误，这需要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深层解读，以更全面、更客观、更现实、更历史的态度重新审视东方社会主义，反思自己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反思自身社会主义的真正前提，从而自觉克服以往在理论和实践探索中的疏漏和不足。当今学界更理性地掀起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潮，对熟知的传统马克思社会理论进行学理层面反思，对那些“不必再进行研究”的定论进行重新审视。以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7页。

开放的思维和敢于正视自身问题的心态，在新时代重新挖掘、提炼一度被人们误读、甚至遗忘的马克思原典中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本真精神，整理自己的理论武库，投入新一轮的东方社会主义建设。

3. 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推进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我们已经胜利完成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任务，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不亚于革命。我国一直都在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而探索。但由于一度忽略了从世界交往中接纳资本主义先进成果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寻求富强之路上延误了近二十年。这一延误，更增大了我国如何尽快实现国富民强的历史使命的艰巨性。彰显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进步、强大的真髓，并指导中国当下建设，这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迫切需求。

苏联解体，使中国担当了更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我们捍卫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简单地捍卫一种抽象的理论和口号，而是为中国的复兴寻找出路。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实现解放的最科学的社会理论，是中国再度复兴的唯一理论指南。中国发展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不在马克思主义书本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勾画出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中国的希望之路在马克思社会理论和中国现实的有效结合之中，只有这种有机结合才有中国的将来。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国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东方社会理论进行总梳理，还要补充进时代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热潮推动了东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在即使遭遇苏联解体巨挫之后，东方社会主义之路开始了逆境中的再奋斗，短暂沉寂后理论和实践双开新。

二、学界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来不是纯粹的书斋式研究，而是始终服务于中国现实发展，始终服务于解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

兴这一主题。即使在意识形态过度干预的非常时期，他们也仍旧通过比较隐讳、曲折的方式来指陈社会弊病，为中国的解放和富强而进行理论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也始终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展开。

对内容的完整复现构成复苏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自改革开放伊始，我国学界涌现出一大批通过挖掘马克思手稿和原典再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学者。如刘启良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朱坚劲的《东方社会向何处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另一方面，研究视角逐渐多元化。从社会形态理论、异化理论、社会构成理论等多维度展开探讨，以追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论证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对策。如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谢霖的《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云飞的《跨越“峡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还有部分学者对单个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传承、发展马克思东方理论的功过进行断代史式研究。如王东的《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俞良早的《东方视阈中的列宁学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并且，现今我国报刊、杂志上，有关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学术文章竞相争鸣，研究规模和深度达到空前水平。这些研究成果无疑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进程。但总体上来说，由于我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仍有相当的空间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深度犁耕。

（1）我们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其目的不在于只是“回到”马克思，而是在返“本”过程中，梳理出其解决东方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本理路，赋予其社会研究方法以时代生命

由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非系统表述文本存在，使原著解读这一方式对把握马克思思想精髓至关重要。解读原著，决非只为遁回历史，在布满灰尘的史实陈述中徜徉，而是在文本中把握伟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理路，实现与伟人跨时空对话，寻求解

决现实问题症候的锁钥，破解当下难题。因此解读者既要抛弃自身当下历史情境，回归文本原初史域；又要剔除历史干扰，返回现世，唯有这种脱今返古、脱古用古的解读才能实现古今贯通，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精髓。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研究肇始于世界历史对东方发展道路的干扰与破坏。他们以印度、俄国的农村公社为剖析典型，试图寻求东方的非西方化发展之路。而在国际形势和东方国内条件均变异了的当代，在马克思、恩格斯解读东方、认识东方，并为东方社会主义之路作了伟大的奠基工作之后，留给后继者的任务是如何走出新时代的东方社会主义之路问题。仅做到原典梳理还远远不够，尚待进一步克服理论研究中仍存在的复述历史事实的流弊，从哲学层面进行本质反思，实现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理解，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应用于东方社会，理论联系实际的精髓才能彻底贯穿，这样才能使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真正具有现实意义。

(2) 政治干预学术研究的状况已经得到根本扭转，但由于这种干预通过思想文化载体而传播，所以彻底根除其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延误这一实情需要理论界的努力才能得到弥补

在历史上相当一段时间，东方社会主义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理论固定化，凝固化，并以捍卫这些原则为圣举。特别是在苏联，一直存在着职业革命家以政治干扰、压制社会理论研究的事例，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职业革命家间经常出现紧张或完全一致的非常态现象。政治越位影响了社会理论的正常发展，极不利于发挥理论对社会发展先行探索的积极作用，以至于官方正统思想具有左右大众思考及言说话语的权力。在政治干预下建立起来的苏联教科书理论体系就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而不容更改和发展地时代传讲，而其社会理论中所缺乏的恰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建国后一直到当今，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构架尚未彻底消除苏联教科书的影响。马克思最富有创新性的社会理论被放置在

很不起眼的位置，并且其中贯穿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系统态和完成态的社会理论，也就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这与东方社会现实存在一定距离。缺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的辩证方法的指导，也就使东方社会主义之路的探索失去了自觉的灵魂。虽然东方社会主义者能够认识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现实结合的紧要性。但是，却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以一贯之地真正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自觉，以至于在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的自觉性一直是在小范围、间歇性的进行。当东方社会主义出现生死攸关的危难之后，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创新提上日程就是其表现，所以，这种自觉极易被误认为是一种生存危机的救急方案。这样，马克思社会理论也就难以彻底完成解释东方现实、改造东方现实的历史使命。牵强附会地在东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社会理论之间建立生造的关系，空洞的口号和与西方社会发展的攀比成为东方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内容。而在无法解决诸多的现实问题之后，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又成为必然的发展逻辑。对马克思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现实的双向误解，不仅遏制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在生机的迸发，而且，致使东方发展遭遇本来可以避免的挫折。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本真精神为指导，彻底认识政治强制对社会理论研究的危害，也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复兴的重要前提。

(3) 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整体性研究不够，存在着突出的一面而忽略另一面的现象

全面揭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得失经验教训，必须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发展历程进行历史性贯穿分析。当今国内学界专门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对这一理论进行详尽解剖，在历史追述中寻查其发展、演进变化的深层根源，在世界历史视阈和民族特色视野的交汇中，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哲学学理层面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在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如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对东方社会理论的作用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这些妨碍了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全貌的把握，也影响

了对东方社会历史行程的全面总结。并且，有的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过程中，或忽视唯物史观和民族特色的有机整合维度；或者缺乏历史性的完整说明；或强调伦理道德而忽视发展的内在强迫性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限制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完整呈现和改造东方效能的最大发挥，也使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多样性缺少从世界历史和民族特色交融维度的说明。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材料多不胜数，但详论并从本质上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发展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统贯东方社会主义建设整个过程，在国内学界尚无人涉足。

历史在我们的理解中复活，理论在时代的召唤中涅槃。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现实的再认识是创造性地重建东方社会历史、寻觅全新的东方社会未来的前提。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本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东方国内、外条件而对这些国家发展道路所作的一次理论探索和远征，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由于时代的迁移和实践的涤荡已失去了现实意义。彰显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的精髓，本来就需要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将马克思理论精髓和东方社会实践相合的过程，克服掉由于政治强制、文本局限、认识局限所造成的对东方社会理论和现实认识的片面性，充分融入以创造为特色的当代性诠释因子。所以，学界智者、仁者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在商榷中辨析、交锋、取补，这是将马克思社会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积极表现，而对于能否达成共识并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观点在激撞、交锋中，能够真正廓清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发展脉络，并使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本质去蔽，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社会理论解释东方、改造东方的绩效。中国现今走上国际舞台，如何在世界历史大潮中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进行全面客观评价已经提到了历史日程，这也是中国当下进行东方社会主义建设所亟需的理论工作。

当今东方社会仍然肩扛着马克思主义大纛的历史使命，东方国度要使社会主义在本国稳固长存并健康发展，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就理当成为其今后发展的不可动摇的指针，理应成为新千年、新时代的理

论生长点。发现并彰显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所固有的东西，克服随意穿凿、附加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所没有的东西，向学界和世人客观呈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内容及发展过程的完整脉络，与时代大潮和中国现实相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精髓的指导下，将东方社会主义建设纳入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之中，继续推进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工作，推进改革开放，就成为时代的呼声和历史赋予东方社会主义理论者的历史使命。

笔者正是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需要，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当今东方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澄清人们对东方建设社会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误解，回应当今国内、外某些贬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阐释东方社会主义之路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迁演中寻查东方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曲折发展的根源。总结苏东巨变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教训，并将之转换为俄国探索社会主义之路时奉献给我们的一份难得的遗产，转赋为东方社会重建和蓬勃发展的历史契机，但愿这能成为苏东剧变对东方社会产生更深层面的第二次影响与提醒。能够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本真精神的当代延续做些探索性和铺陈性的工作，为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为推动东方国度社会主义实践的蓬勃发展而尽力，这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由于这一课题所涉及的内容庞大，时间总跨大，涉及人物较多。它不仅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包括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这三位重要代表人物，并包括民粹派的一些思想家；不仅包括东方社会主义建设的过去，还涉猎当下；甚至许多人物，他们的观点早期、中期、晚期存在矛盾，观点庞杂繁复，更增加了写作难度。笔者在写作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一、选题缘由	1
二、学界研究现状	5
第一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1
一、东方发展可能之一种：资本主义	4
（一）资本：东方发展的强劲内驱力	4
（二）资本：覆毁东方封闭的前提	8
（三）不足：民族视维缺失	9
二、民粹派提案：村社社会主义	13
（一）以民族特性对抗资本普遍性	14
（二）民粹派东方提案需要根本重铸	20
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28
（一）东方社会主义之路	29
（二）两种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41
四、恩格斯晚年对东方社会理论的发展	45
（一）西方革命沉寂后的东方之路	45

(二) 反对“嫁接论”	47
(三) 对农民问题的探讨	53
五、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深蕴	54
(一) 社会理论新高峰	54
(二) 东方社会研究方法的革命	56
(三) 解决东方问题的方法论原则	59
(四) 揭示了东方传统出场的路径	60
 第二章 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合理性之争	62
一、质疑与明辨	64
(一) 东方能否先于西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65
(二) 东方能否在物质条件尚未齐备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66
(三) 东方能否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68
(四) 东方在不充分文明条件下能否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70
(五) 东方暴力夺权能否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	72
二、争论的实质与产生分歧的原因	77
(一) 实质	77
(二) 产生分歧的原因	77
(三) “跨越”后的历史难题	87
 第三章 东方社会主义的实践转向	91
一、新政权的生存问题	91
(一) “喘息”政策	92
(二) 战争经济模式	96
(三) 政治越位的危害	98

二、国内外环境再造·····	103
(一) 再造国内环境·····	104
(二) 再造革命环境·····	112
(三) 成就·····	118
 第四章 形而上学思维笼罩下的东方社会主义·····	125
一、封闭的社会主义模式·····	125
(一) 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	126
(二) 强大和完善之间的抉择·····	128
(三) 寻“强”的社会主义模式·····	134
二、理论探索权利的垄断·····	142
三、走向封闭的原因·····	148
(一) 两极对峙的国内、外环境强化了斯大林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149
(二) 马克思、恩格斯系统态和完成态的社会主义理论对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50
(三) 斯大林对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规律关系 把握不完全到位·····	152
(四) 追赶和超越带来的煽动情绪时代强化了斯大林 施政的激进性·····	154
(五) 思想垄断和对领袖的绝对信任使东方民众普遍 存在思考冷淡症·····	155
(六) 苏联理论界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精髓的不完全把握造成了 指导理论偏离学术探讨的总氛围·····	156
 第五章 东方社会理论的否定性接续·····	159
一、完善还是毁灭·····	159

(一) 诞生与继续偏离	160
(二) 学界努力	165
(三) 停滞与背叛	174
二、倾覆后的反思	180
(一) 俄罗斯理论界反响	180
(二) 倾覆后的反思	184
 第六章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当代丰展	191
一、发微：新民主主义革命	192
(一) 马克思社会理论精髓的中国应用	193
(二) 中国复兴初探	198
二、彰显：改革开放	201
(一) 视界的再度融合	201
(二) 东方传统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208
 结束语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30